

王  
仰  
之

丁文江年譜

6.1

丁文江年譜

丁文江年谱  
王修之

出版：江苏教育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江苏海门印刷厂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3.875 插页6 字数78,400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册

ISBN 7-5343-0669-8

K·11 定价：1.70元(贴塑)

责任编辑 褚庆林



王 景 伟

---

---

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教員與部分畢業生合影



1915年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教員與部分畢業生留影。

前排自左至右為翁文灝、章鴻烈、丁文江。



湖南長沙岳麓山上的丁文江墓

平西重畧古之打獵事竟無甚不率計較以至  
者當有甚害不能又因途遠車馬易不勝不務有  
便轉久不擇山度數不以將赴萬里徑途至  
大抵寧夷所知其間陽物皆得全在當處而問  
者不申偶見也幸勿疑

人年月廿二日

送狀

後學不若昔

先生與在上是固多矣子為故城而未久  
往者代耕名義歸則終、代耕秋毫了未  
不勝也

丁文江遺墨

1930年1月31日丁文江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(筠生)

信。此信由张氏哲嗣张树年先生提供。

# 徐霞客遊記

丁文江編

冊上

丁文江編  
《徐霞客游記》

商務印書館叢行

## 序

王仰之先生花费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，编写了一本《丁文江年谱》。材料收集得很丰富，文字编写得也很精炼，是一本很好的书，是一本很重要的书，是研究丁文江先生的基本资料，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关于丁文江先生，蔡元培先生曾评论过：“在君（丁文江字）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的科学家。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，普通能办事的、又未必精于科学。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，如在君先生，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。”几句话说出了丁文江先生才学的大概。蔡先生宽宏大量，知人善用，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期，请丁先生做总干事。

丁文江先生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。他是地质学家，对中国地质事业作出卓绝的贡献。他对动物学、古生物学、人种学、地理学、地图学等均造诣很深，驰名中外。他和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之论战，涉及哲学的范围。他发表过不少文章，是有关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甚至是军事的。他不只是一位理论家，他还是一位多才的事业家。他创建并发展了中国的地质事业，作过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，上海淞沪总办，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，并主持过马鞍山钢铁公司的筹建工作。在每一段工作里都做出了成绩。

丁文江先生不只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，他还是一位公而无私的正人君子。他做过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，是资本

家的代表；他做过上海淞沪总办，是军阀孙传芳手下的一大官。这些都是有机会弄钱的差事，而丁文江临终时却是两袖清风。他一向都是以事业为重，从不谋求私利。他生前曾说，他家里的人长寿的不多，他大概也不会长寿，要抓紧时间替国家多做点事情。有些外国人说丁文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稀有的人物，对他的治学、做人和事业，都值得进行研究。王仰之先生的《丁文江年谱》，对研究丁文江先生将起重要作用。

高根西  
1987年5月

## 前　　言

丁文江（1887—1936），字在君，江苏泰兴人，他是我国早期卓越的地质学家。他对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建、巩固和发展，起了重要的作用，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。

丁文江是很活跃的也是很有魄力的人。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，除了地质学，对于生物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人种学以及经济、外交等，都有相当的研究和造诣。他能阅读俄、法、德、日、英等文字的书籍，能说英、法、德三国语言，英语尤为流利。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凡是他认为有意义的事，想到就做，并做得很好。蔡元培先生曾说：

“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的科学家。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；普通能办事的，又未必精于科学。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，如在君先生，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”。<sup>①</sup>徐盈先生最近给笔者的信中认为：“没有地质学拖着他，他也许是中国的一位大企业家”。

丁文江勤奋一生，而他的一生却非常短促。尽管他的贡献很大，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也很丰富，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，主要是1926年曾做过半年多淞沪商埠总办，一些求全责备的人，就把他一概否定，甚至在中国地质史上，也没有给他一席之地，这是不公正的，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，祖国形势蒸蒸日上，科学园中百花盛开。对于丁文江这样一位有作为、有成就、有贡献的科学家，许多人都

深情地怀念着他。1985年湖南省当局拨款重修了岳麓山上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破坏了的丁文江墓，1986年4月在长沙，1987年4月在江苏泰兴、10月在北京，都举行了关于丁文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。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丁文江这个人，本人乃搜集有关档案和文献资料，编写了这本《丁文江年谱》。在编写过程中，黄汲清、高振西、夏湘蓉、李春显、曾世英、张祖还、徐盈、高沫源、陈江诸先生都给了我不少指导和鼓励。其中黄汲清教授曾两次仔细地审阅原稿，对原稿提了几十条修改意见；高振西教授为了详细介绍丁先生的情况，曾多次接待我，与我作长时间的交谈。书稿写出来以后，又抽空审定，还抱病写了一篇序。老一辈专家对我的种种关怀，我当铭记在心，并把他作为推动自己奋发向上、克服困难的力量。

王仰之  
1987年11月

# 目 录

序.....	1
前言.....	1
丁文江年谱.....	1
附录:	
一、丁文江逝世后的纪念活动.....	80
当年的追悼.....	80
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.....	82
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活动.....	84
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活动.....	84
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.....	85
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.....	87
关于纪念基金和纪念奖金.....	88
纪念书刊的出版.....	91
塑象和修墓.....	94
二、对丁文江的评论摘录.....	97
三、关于丁文江纪念和研究文章索引.....	107

# 丁文江年谱

1887年

4月13日（清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二），出生于江苏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富绅家庭里。

父名臻，字吉庵，为当地士绅；母单氏。据丁文涛回忆：“先严……诸事旁午，鲜有暇晷，涛兄弟以养以教，一以委之先慈。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，而起居动止，肃然一准以法：衣服有制，饮食有节，作息有定程。一钱之费，必使无妄耗。事能亲为者，毋役僮仆。即不能，偶役僮仆，亦不得疾言厉色。……”<sup>②</sup>丁文江许多好习惯的养成，当和母亲家教有关。

丁文江有同母兄弟四人，他排行第二，其兄名文涛，两个弟弟名文潮，文渊，还有异母弟三人：文润、文浩、文治。

1892年 5岁

入私塾念书。

据丁文涛回忆：“亡弟于襁褓中，即由先慈教之识字。五岁就傅，寓目成诵。”<sup>③</sup>

1896年 9岁

读完四书五经，并且特爱诗词。在私塾中，除完成规定的功课外，还自己找些书看。再三念过并作有笔记的有顾亭林的《日知录》、黄梨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。当时还是八股取士，塾师叫他注重八股文，他虽也做了，但并不喜欢。

1898年 11岁

作《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》，全文数千字，深得塾师赞赏。

1900年 13岁

考秀才。当时泰兴县知县龙璋<sup>④</sup>得知本邑有这么一个神童，命他到县署内特别面试。龙知县给他出了个题《汉武帝通西南夷论》，他当面提笔为文，洋洋洒洒，多所阐发。龙璋看后大为叹异，收为门下弟子。

1901年 14岁

龙璋劝丁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。丁父有难色，龙乃亲自托同乡胡元琰（子清）偕丁同行。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留学，这在泰兴是破天荒的事。“戚友多疑阻，先严不免为所动”（丁文涛回忆），结果还是“举债以成其行”。

这一年，丁曾作七绝一首：“男儿壮志出乡关，学业不成誓不还；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有青山。”以示其抱负和胸怀。

1902年 15岁

留学日本。

在日本，丁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，过着当时东京留学界“谈革命，写文章”的生活，并没有正式进学校学习。

1903年 16岁

在日本。

曾打算学海军，因鼻子有病，嗅觉不灵而作罢。

1904年 17岁

年初，仍在日本。

丁在日本留学的情况，据当时和他很接近的汤中（爱理）回忆：“当时在君……和我们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。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，写文章。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1904年的前后，出了好几种杂志，都是各省留学生创办的，如湖北留学生之有《湖北学生界》，浙江留学生之有《浙江潮》，江苏留学生之有《江苏》，……《江苏》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（永建）先生，第二次是汪袞甫（荣宝）先生，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。”<sup>⑤</sup>

关于刊物的情况，后来丁文江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中曾提到过，他写道：“有个时期，人数不足一千的中国留学生出版了六种月刊，每期有二百页。这些刊物很快就把已经开始的‘中国复兴’的激进思想传回到中国大陆。除了要求政治改良外，留学生中的革新派还提出要禁绝鸦片，反对缠足，他们讥评孔儒传统教育，提倡妇女解放。……”<sup>⑥</sup>

2月，日俄战争爆发。

日俄战争发生以后，在日本的留学生，颇受日本人的排

笑，有许多学生因受了刺激，无心读书。这时候，丁的一个同学接到了一封从英格兰寄来的信，写信人为被中、日两国政府以进行反满煽动为名驱逐出境的吴稚晖。吴稚晖当时在那里研究进化论和古生物学。他说“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，吃中国饭，谈政治而不读书”，很不以为然，竭力鼓励他们离日去英，并说在英国，估计一个中国人一年只要五六百元收入就够用了，而且教学质量也比日本强。于是就和同学李祖鸿、庄文亚等商量，并征得父母同意，决定离日赴英留学。当时的情况，据李祖鸿的回忆：“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，预备了大约一个月的英语，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，比庄文亚和我都差；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，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，都是他出头了……”。

“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时间大约是春夏之交（汤中说是三月某日）。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，说来也甚可笑。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，交他带去，至于以后的接济，却毫无把握。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、五百元，以后却再无法想了。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，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，先把这个款归我带去。总算起来，总共不过一千七、八百元。”

“依我们当时的计算，日本邮船价廉，……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。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，日本船不能乘，于是改乘德国船，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。……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，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。到我们（在上海）上船赴英国的时候，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，……”。⑦

去英路上和到英国之初的情况，当时丁在给汤中的信中

曾写过这样一段：“船到槟榔屿，遇见康有为先生，送我们旅费十镑，才能够到爱丁堡。但到了爱丁堡，三人身上只共剩旅费五镑，后向康有为先生的女婿罗昌先生借得二十镑，即同毅士离去爱丁堡，而往英国东部一个名叫司堡尔丁（Spalding）的村子，进了这个村子的一个中学读书。当时寄宿的地方距学校不远，每天来往都是走路，往往遇到下雨，袜子总浸湿了，归寓以后，把袜子脱下晾干，至明早再穿上到校，因为只有一双袜子，所以无法替换。”<sup>⑧</sup>

丁在英国留学的生活，他自己有过一段概括的叙述：“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。……幸亏在爱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（John Smiller），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，知道我是穷学生，叫我到乡下去进中学。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去，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，生活程度很低。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（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），房东还给我补袜子。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百余元，还连书籍在内。我在那里整整过了两年：书从一年级读起，一年跳三级<sup>⑨</sup>，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。

“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，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，而且因为他的关系，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，不是这家喝茶，就是那家吃饭，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”。

这一时期，丁文江还曾随班奈儿夫人的第五个女儿学习钢琴，只学了两个星期，就能够弹“Home Sweet Home！”

除了学钢琴，丁还曾学骑马。